

124063

文史資料選輯

第 四 輯

(內部發行)



K250.6
3739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遼寧省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遼 寧 人 民 出 版 社

1964年·沈陽

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

Wenshi Ziliao Xuanji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公安厅印刷厂印刷

字数：140,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

1964年6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2次印刷

印数：8,001—12,000

统一书号：11090·142

定价：0.75元

编辑凡例

一、本选辑的编刊，是为了积累、保存历史资料，并用以推动撰写史料工作的开展，供历史研究工作者参考。

二、本选辑所选的资料，包括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各个时期的各个方面，不拘体裁，只要有研究参考价值，即可刊登。

三、本选辑所刊登的资料，大都是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内容可能不尽翔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因此，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发行。

四、本选辑所刊登的资料，欢迎阅者提出补充和订正。

五、本选辑对于来稿，可加以综合、删节、选录和文字上的修改。

目 录

国民党暂编五十八师营口起义经过	王家善 (1)
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回忆	荆有岩 (25)
东北海军的分裂与两舰归还建制	张凤仁 (40)
“九一八”事变纪略	李济川 (64)
平顶山大屠杀惨案始末 政协抚顺市委员会文史办公室	(71)
虎口余生	杨占有 (96)
锦西民团歼灭古贺联队经过	郭 远 (102)
东北义勇军第二军团概述	李纯华 (109)
义和堂药店百年兴衰记	董玉书 (121)
邓莱峰六十年祭	杨圭方 (145)
关于清代的庄头	李在南 (156)
记伪满“道德会”	毕玉洲 戴善友 (168)
补充·订正	
关于第一辑的几点订正	王中立 (181)
《西安事变中的兰州情况》补零	赵日新 (183)

国民党暂编五十八师营口起义经过

王 家 善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暂编五十八师在我（我当时任该师师长）率领下于营口起义，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这支部队乃从黑暗死亡线上走上光明新生的大道。现将其经过概述如下：

一、部队沿革和我的思想变化

暂编五十八师是由东北保安第四总队改编而成的。东北保安第四总队，又是在一九四五年末和一九四六年初，收编东北各地方武装部队而成的，共为六个团，驻长春，和东北保安第二总队共同担任防守任务。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四日解放军解放长春时，把这两个部队打垮了。保安第四总队司令陈家桢因伤被俘，第二总队长刘德溥当时行踪不明。因而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命我（当时我在东北保安司令部当参议）和东北行辕高参王化兴到铁岭收容这两个部队。四月末，第四总队共收容了官兵近七千人，五月六日我被任命为第四总队司令。六月三日部队移驻长春（这时解放军已撤出长春），担负长春守卫和整编部队任务。这支部队成分很复杂，有伪满军队、警察、山林队、护路警及光复后临时组成的地方武装，也有少数土匪，官长多系伪满军官（这支部队成立时由我帮助组织，许多官长和我都有关系）。因为在长春防守战中经过了一次严重打击，损

失很重，故在整编中非常伤脑筋。当时东北行辕只给补充了一些步枪、轻机枪、六〇炮等武器，整编后为三个团。到九月中旬，按编制又补发了重武器，并改编为第十三保安区，十月九日移到辽东地区岫岩、凤城、庄河一带驻防，临时代号为独立第九师，暂归新六军指挥。部队驻地分散，任务繁重，入冬后天气很冷，官兵冬装尚未发下来。我虽一再请示上级，但终未得到解决。我不得不到沈阳周旋。经东北行辕参谋长批准尽先发给，可是到了军需司和被服科，他们却打起官腔来，硬说库无成品，碍难照办。据我当时了解，仓库存有服装，我知道这是他们要敲竹杠。为了官兵能及时换上冬衣，只好上下浇油，幸而通过了这一关。到了仓库，尽管事前送了个“小门包”，哪知道他们的胃口也不小，伪称库里现有的都是次品，要领就是这类东西，要领好的就得等些日子，结果又补送了一次，真是立见功效，很快就领到了一级品。从这个问题也不难看出，国民党军队腐败到了什么地步。

服装问题解决了，但又来了新问题。新六军派出一个所谓前进指挥所，由一名副师长许颖担任指挥，负责指挥第九师。他与第九师师部同住岫岩县城。关于第九师的作战行动，全由许来包办。我这个正职反被副职指挥，这种做法使我精神上很不愉快，从军事指挥原则上来说也是令人难以理解的。这充分说明嫡系歧视杂牌军，我深深地感到杂牌部队到多咱也吃不开，自然就产生了一种不满情绪。

一九四七年四月初，国民党放弃了安东地区，独立第九师同时受命向辽河以西转移，在辽河、锦州中间地区打游击，牵制解放军。当部队撤到营口时，看到营口没有驻防部队，人心惶惶，已陷于无政府状态。经了解后，知道市里显要人物都在前两天溜之乎也。我当时想，营口是战略要地，需要有部队防守，不能轻易放弃。于是向东北行辕和长官部发出了请命的电报，说明营口是东北战略要地，又是辽河东西交通孔道，也是

关内外联络的第二干线，建议应当固守，独立第九师愿意承担这一任务。东北行辕复电批准了我的建议，并命独立第九师驻守营口，担任该地区的防守任务。

四月中旬，独立第九师在营口、大石桥两地集结完了，我率师部和主力驻守营口，派三团驻守大石桥。随即积极地改建和修补工事。五月十日前后，解放军辽南部队向营口、大石桥发动第一次攻击。当时解放军以一小部兵力牵制营口，以主力攻击大石桥，激战一昼夜，第三团受挫，被迫撤出大石桥，退到营口。次日，解放军即大举围攻营口，战斗一夜，解放军即撤走。在这次防守战中，东北行辕调东北保安第二总队增援，但部队到达时战斗已结束。第二总队在营口驻不久（四、五天），又受命进驻大石桥，到大石桥不到一个月就被解放军给打垮了。七月末，独立第九师又改编为暂编第五十八师，归五十二军建制。这时部队的装备虽经过两次补充，但还是很差。

八月初，东北行辕主任陈诚电召我去沈阳汇报情况，我乘机要求补充人员，充实装备，陈当面答应了。我回到营口之后即拟订招募、补充兵员计划，报东北行辕备案，并在师司令部组织招募委员会，派出十几个小组，到辽阳、海城、盘山、辽中、营口等县进行招募。因为所选的招募人员多系各该县出身，可以利用乡土关系；又兼五十八师是东北部队，东北正处在战争时期，许多青年失业，因而不到两个月，两千七百名新兵的补充计划就完成了。部队补充兵员，增强了战斗力，在这国民党当局不能有计划地补充兵员的时候，本来是件有利的事。可是长官部却来电申斥：“自行招募，违背国家法令，应立即停止。”这时我们的招募计划已基本完成，工作将告结束。随即复电：“遵命，停止招募。”我未提招募是陈诚面许，并已在行辕备案，恐怕犯下“目无长官之罪”。长官部为什么要过问这件事呢？其原因是当时东北共有四个保安总队，统归东北行辕直辖，只是在作战时临时归长官部指挥，听说熊

式辉和杜聿明为这四个总队的隶属问题有争执，这次对我的问罪也可能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所幸这次充实兵员是经陈诚面允的，又在行辕备了案，否则难免不充当“替罪羊”。

八月末，接东北行辕通知：“补充五十八师的武器，已全部下拨五十二军转发。”但过了半月余尚无消息，我即电问五十二军。军部复电称：“武器尚未拨到。”当时我很奇怪。又过十余天还是无消息，而部队需要补充武器实是如饥如渴。故再电催，这次复电是：“武器尚未到齐，到齐后即转发。”我接电后有些怀疑，同时也很气愤，随即向东北行辕电询：“补充五十八师的武器是否已全部拨交五十二军？”复电：“补充五十八师之武器已于八月末全部拨交五十二军转发，可向该军直接请领。”我即持东北行辕复电去辽阳军部交涉，这时才给拨一些经他们修理好的破烂武器，而把行辕拨给的好武器装备了自己的嫡系部队。这种宗派主义的作风，使我精神上又一次受到强烈的刺激。

十月上旬，解放军第二次围攻营口，这次围攻与第一次不同，不仅兵力多，而且有野炮、山炮配合，激战两昼夜，当时赖有四艘军舰在辽河上支援，营口未被攻陷。在这次战斗中，东北行辕又调交警一个总队来支援。在战斗最激烈时，交警总队已经进到辽河西岸，但按兵不动，隔河观战。当时我派副师长过河向曹总队长（不久即去职）一再要求，他才派过来一个大队，但这个大队又借口不明敌情、没吃饭、疲劳等，不参加战斗，直到天亮才进入第一线，可是一枪未放，解放军已撤走了。

战斗刚刚结束，恰值国民党海军头子桂永清来营口视察他的海军（其实桂早已到营口港口外，而在舰上作壁上观）。他对舰队打坏了一门主力炮大发脾气，痛斥舰长。舰长为了推卸责任，就说王师长一再要求炮火支援，所以就打坏了。因而他对我很不满，责备我说，你不懂海军炮的性能，过多地要求打

炮，给国家造成多大的损失。但是他对营口得失，却漠不关心，对营口防守战只字未提。我做梦也想不到，一位海军总司令、海军上将竟会如此狭隘，如此无知。

但这次战役引起了国民党对五十八师的重视，加上北宁路关外一段经常被切断，更感到营口港口和营沈线在战略上的重要意义了。对保卫营口需要加强力量，因而又给五十八师补充了一些武器、弹药，并配属了一个野炮连、一个化学迫击炮连，再加上交警总队。

交警总队到营口以后，重新划分了防区，交警担任东部地区防守任务。在营口东部有个制镁厂划在交警防区内，我到营口时还很完整，派一个排保护这个厂。在接交防务时，我特别对李安总队长说：这个厂很重要，全国很少，应注意保护。他们不但不保护，反而暗地把厂内的铜制管道和铜电线拆除，运往上海高价卖出，大发横财（当时关内铜非常贵）。我听了很气愤，去找李安。他说：“不可能吧！我查查，如果有，一定制止。”事后，工厂还在继续被破坏，我又和市参议会去谈。该会派代表向交警提出抗议，但都无效。可是他们运铜装船时，必经西部五十八师防区；五十八师以为禁运物品，禁止通行，因此曾发生武装冲突。以后，他们就把铜用小船由河里送上大船，绕过五十八师防区，照样外运，致使工厂全毁了。事毕，他们扬言老百姓把工厂破坏了，企图掩盖自己的罪恶行为，这件事使人非常痛心。

十月初，五十二军派郑明新副军长到营口，成立了前进指挥所，指挥五十八师和交警总队。郑在指挥这两支部队时很不公平，供应上处处照顾交警，分配任务时却额外照顾了五十八师，从而加重了五十八师的负担。从一九四七年冬到五十八师起义这个期间，营口民粮奇缺，军粮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五十八师不但不能领足应发的数量，而在领到的不足数量中，又多为粗粮。可是交警总队不但细粮多，而且冒领。当时五十八

师官兵每天得喝一次粥，而交警总队竟高价出卖余粮。我曾多次建议郑明新点验交警总队人数，核实发粮。郑虽口头答应，但总看不到实际行动，弄得五十八师官兵愤愤不平。郑明新明知交警虚报冒领，可又为什么不清点核实人数呢？当然也有他难以告人之隐。郑对五十八师仅是口头上的信任，他所依靠最后保驾的还是交警。因此他不得不多与交警拉关系，拉好关系不但保驾有人，而且还有利可图。在当时郑明新和李安所想的不是如何团结部队鼓舞士气，共同完成守城任务，而处心积虑的却是另外一回事——如何保全自己的生命、财产。

入冬以后，再度收复大石桥时，五十二军派主力第二师由北向南进攻，命五十八师由西向东配合主力。五十八师派出第一团从西面攻入大石桥，第二师从北面攻入。两个部队为争首功发生了争吵，当军长覃异之、第二师师长刘玉章及军参谋长廖传枢等人到大石桥后，听了第二师军官片面的汇报，对五十八师就有了先入为主的不满。当时五十八师第四连有两名士兵，受连长命令，把他们由农民会拿来的东西送还农民会，在途中被他们碰上了，硬说这些东西是抢老百姓的。虽经士兵再三声明是送东西，不是抢东西，他们却不分青红皂白，根据偏听偏信，竟说：“你们打仗不勇敢，争功却很起劲，目无军纪，乱抢东西。”一怒之下，把两名士兵就地枪毙了。我听到报告后，乘车急驱大石桥，行至途中，遇见覃、刘等正来营口，见面即声色俱厉责备我一番。到营口之后，不管我心里怎样不满，还得勉强尽地主之谊，设宴招待。席间，收复大石桥成为谈话的中心，就地枪毙两名士兵是否合理成为争论的焦点。争论中，刘玉章傲慢自大，盛气凌人，大有不可一世之概，冷嘲热讽，令人难堪。参加宴会的覃异之、郑明新、刘玉章、廖传枢和袁鸿奎市长、李安总队长等人，都把火力集中到我和五十八师副师长唐仕林（不是嫡系）两人身上。这场争论充分暴露了嫡系和非嫡系之间的矛盾在日益加深。经过争论，尽管

是真相大白，他们还是袒护嫡系，把一切罪过都推到我身上。当时我甚感不平，他们走后，我越想越气愤，不禁回忆起一幕一幕的往事来。

首先我想起了“官大胆小，去而复返”的袁市长。在我到营口不久，有一位身着中将军服的客人来访，见面声称：“兄弟叫袁鸿奎，此次奉东北行辕熊（式辉）主任和长官部杜长官的命令来营口任市长……”又说：“我和杜长官在黄埔军校同期又是至交。”我心想，这是有来历的，又是黄埔军校出身的嫡系，一定能效忠蒋家王朝，这位将军市长对防守营口定能有些帮助；同时营口有了市长也免去我的一些负担。因而我感到很高兴。袁到任后，很有个派头，很会做国民党式的官。我却没有想到这位将军市长对打仗那么胆小。当五月中旬解放军第一次攻击大石桥、营口时，大石桥刚刚打响，营口尚未进入战斗，这位市长就溜之大吉，逃回沈阳了。可是上级对这位擅离职守的市长并未加以申斥，却电令我兼理市长职务。我对市政业务是“桌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又在这种军务繁忙的混乱情况下，如何能兼理市长的职务呢？但上级命令不能违背，当然我也知道这是临时官差，只好尽力而为之。经过这次防守战之后，营口周围环境逐渐稳定，营口、上海之间，轮船来往逐渐增多，市面也随之繁荣起来了。这位开小差的市长又大模大样地回到营口来接职。我们见面寒暄几句后，他就从口袋中取出一张用“便笺”写的纸条给我。我看是杜聿明的手谕，令袁复原职。当时我尚未接到行辕的指示，尽管我对这个受罪的市长职务不感兴趣，但没有行辕的指示也不能马马虎虎地交出去。我对袁说：“我尚未接到行辕指示，等打电报请示一下再办交接。”袁说：“好，好好。”我又想行政归行辕，不归长官部，为什么这位市长只拿杜长官的手谕，而没有行辕的命令就来接任呢？我颇为奇怪，就给行辕去电请示。复电称：“袁鸿奎既已回到营口，可将市长兼职交出。”当时我又想到，危险时让杂

牌顶数、卖命；太平时嫡系又来做官享福，这也太不公道的。据事后了解，袁二次回营口任市长，行辕并不同意，但熊为了避免和杜的摩擦，也只好将计就计。这充分说明了他们的内幕该是多么复杂啊！

其次，在营口港口，常发现砸碎机器卖废铁的怪事。一九四七年夏、秋两季，上海、营口间的航运畅通，有些奸商和贪官勾结，把沈阳、鞍山等城市的完好机器砸成碎铁，运往上海高价出售，牟取厚利。有人要问：他们为什么不把完好的机器运到上海呢？原因是日寇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有规定：凡东北的机器禁止运进关内，但碎铁废钢例外，因而这些丧心病狂的奸商和贪官，为了自私自利，就不顾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勾当。这种奇货有时也被东北行辕驻营口的“物资检查站”认为是非法物资而扣留，可是事过不久，这些被扣物资又用船装运走了。揭开真相，原来都是“孔方”的力量。以后我想，这类破坏国家财产，盗卖国家物资的事情，在国民党统治的社会里，一定到处都有，营口码头出现的现象不足为奇。这种砸机器卖碎铁的行径，无异是为蒋家王朝敲起了丧钟。

随之，我又想起了东北光复初期的往事。东北光复不久，鱼肉人民成性的国民党“劫收”大员们，纷纷飞来东北，竟以接收为名，营私舞弊，前门贴封条，后门运东西，贪污腐化，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对人民的疾苦漠不关心。他们的所作所为，正如当时人民所说的：（1）三迷（财迷、色迷、官迷）成风，（2）五子（金子、银子、房子、车子、婊子）登科。只顾“劫收”金钱物资，不知接收人心。东北三千万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过着悲惨的生活，呻吟了十四年之久，他们梦寐以求的是光复。今天日寇投降了，人民的愿望实现了，可是这些“劫收”大员给人民带来的不是希望而是失望。我想人民的愿望如果寄托于这样的政党和这样的“人物”身上，

真是等于水里捞月。尤其最近时期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国民党内部的争吵日益剧烈，军权、政权派系之争日益尖锐，所谓蒋介石嫡系更加飞扬拔扈，排除异己，因而造成非嫡系离心离德，士气消沉，纲纪废弛，损兵失地与日俱增，民怨沸腾日甚一日，这些都证明了蒋家王朝的末日即将来临，遂使我对过去的希望和理想，都产生了怀疑并失去了信心。过去我把一切希望都寄托于国民党身上，谁想今天的国民党却腐化到这等不可救药的地步。我如果这样混下去，必将和国民党同归于尽。在这种种事实的刺激下，我思想上起了剧烈的斗争：战矣哉？和矣哉？战则五十八师和营口市偕亡，这对营口市和全体官兵又有何益？即或侥幸胜利了，也不过是给人家打天下而已，别人坐天下就没有我们的椅子了。况且从当时形势分析，营口解放已经是注定了，只不过时间早晚而已。当时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条路——起义，没有第二、第三条路可走。起义不仅可使营口市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战争损害，根据共产党的政策，五十八师全体官兵也能得到新生，何去何从，抉择的时候已经到了。

但又想全师起义是一件大事，它不仅关系到全师官兵和营口市人民的命运，而且会影响到东北人民特别是青年人的前进方向，并对国共两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的斗争也会有一定的作用，必须慎重行事。当时我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了解的还很少，为了确定今后的政治方向，实有更进一步钻研的必要。于是我就找东北行辕驻营口情报参谋王明仁（他是我的学生，听说他是共产党员），要他给我找些共产党的书籍看看。开始他只拿来些《大众哲学》和整顿三风之类的书给我，以后又拿来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些伟大著作给予我极大的启示和教育，真是茅塞顿开，改变了我过去对共产党的不正确的观点。我初步认识到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是真正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因而深得人心，为中国人民所

拥护。况且有当代杰出的政治家，天才的军事家，伟大英明的领袖毛主席的领导，革命哪有不成功的！中国哪有不富强的！中国富强是我的理想。有了上述这些因素，在我思想上奠定了向左转走共产党的道路的基础。

二、酝酿计划 准备行动

一九四七年解放军发起冬季攻势以后，国民党军队遭到了严重打击，被迫由分区防御转为重点防御。东北地区的四十多万蒋军，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等几个孤立地区，苟延残喘。营口四周的城市全被解放，交通断绝，完全陷于孤立状态。我们所能活动的范围不出四十华里，内缺粮草，外无援兵，民食奇缺，人心惶恐。而五十八师与交警总队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官兵战斗士气逐渐消沉。这些具体情况，促使我的起义念头日趋坚定；但也未能完全解除顾虑。尽管过去有些被俘人员回来说共产党如何宽大，有的起义部队也得到了宽大待遇，而自己又怎样，是否能得到宽大？部队能否存在，后果如何？一连串的问题，经过反复思考和长时间的思想斗争，终于下定了决心：相信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坚决起义。

起义的决心下定了，可是起义必须事先和解放军取得联系，同谁联系，怎样联系呢？又成了新的问题。正在努力设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石砥同志（原名石玉林，同我一起工作过）给我捎来一封信，动员我起义。信中说：哈尔滨总政治部派他来辽南和我联系，希望我起义。我得到信后，当然很高兴，但我又怀疑他是否能按我的理想办好这件大事，因而又让送信人（原第二团退职连长）班笠夫捎回一封信，请石砥详细说明来历及如何与哈尔滨取得联系等问题。有了上述的思想基础，又有了联系的线索，于是起义的决心就更加坚定了。

此后，我就一边同解放军取联系，一边在内部开始了酝酿工作，先后找三团长戴逢源、二团长史维中、一团长贾绍华和参

谋处长梁启章等人个别谈话。他们每个人当时既不表示赞成起义，也不表示反对，只说师长怎么主张我就怎么做。不过也都提出了一些问题，内容大致是：中国将来的形势怎样，国共两党究竟谁能胜谁，国际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谁存谁亡，起义部队能否存在，以及官兵和家属的安全等问题。当时就我个人看法，都作了答复，说明了在国际上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是肯定的。国民党人心所背，失败是注定了的。共产党人心所向，最终必定要统一全中国。我们起义，将能为国民党其他部队树立一面旗帜，开辟一条道路，一定能受到共产党的欢迎。根据共产党的政策，起义后部队一定能存在，官兵及家属的生命、财产定能得到安全的保障。经过解释，大家都同意了起义。可是副师长唐仕林和参谋长张翻都是东北行辕后派来的，对他们的工作比较困难。我就叫参谋处长梁启章做张翻的工作，副官处长田贡吾做唐仕林的工作。以后据梁、田二人汇报，唐副师长曾透露说：“咱们师长朋友多，在危急时是有办法的，我相信师长。”同时他又吐露交警总队我们湖南籍的老乡军官和他谈过，都感到前途暗淡，也希望咱们师长有个好办法。看来他的问题不大。但张翻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他哥哥在新一军当师长，他态度很坚决：“要坚持到底，固守营口。”我了解这些情况后，就叫梁、田继续做这两个人的工作，并监视他俩的行动。同时我又找平时比较进步和我私人关系较好的营、连长个别谈话。谈过的人大多数和团长们的意见差不多，经过解释，最后也都同意起义。一些骨干思想通了，就分头进行深入的工作。

正在这个紧要关头，有一天，郑明新副军长来电话说：“听说有人来你师鼓动部队叛变，尽快逮捕此人。”此人是原五十八师第二团解职团长乔遇春，来营口鼓动部队起义的。我在头一天已经听说了，正想找他谈话，没想到郑也知道了。我马上把乔遇春找到师部。我问他的来意，乔说石砥派他来了解

五十八师的情况，并做些宣传工作。我问他：“为什么不先到我商量呢？”他说怕我不同意扣起他来，故先到二团打听打听情况，看看部队和你的动态，然后再见你。我说你没有经验，工作还没做多少，就被人家察觉了。我把郑的电话内容告诉他。当时乔显得非常惶恐不安，我说你不用怕，我不会拿你送礼；但你必须在十二点以前出城。当天我就派人在十二点以前把他偷偷地送出城去，到下午一点我就向全师发出逮捕乔遇春的命令，并向郑明新汇报说：“确有此人，我已下令逮捕他。”过了几天，班笠夫又送来石砥同志的信，对我提出的疑问都作了肯定的答复，并约会我派代表在老边会谈，要求我提出具体条件。我选派了参谋王文祥（我侄子）和第三团团副刘凤卓二人，带着我提出的起义条件，并要求四野总部作出正式答复。条件大致内容是：

- 一、保证部队编入解放军序列；
- 二、保证部队的原建制；
- 三、保证部队和解放军享受同等待遇；
- 四、保证部队官兵及家属生命、财产安全；
- 五、保证对全体官兵既往不咎；
- 六、部队人员、武器调动时得我同意；
- 七、师长以下的军官最低要保持原级原职；
- 八、部队起义后，希望尽快参加解放战争。

在老边，五十八师代表和石砥、辽南军区参谋长金振钟举行了第一次会谈。他们说将我提出的条件电请哈尔滨总部，等答复后再进行第二次会谈。二月二十二日辽南军区又派班笠夫携带四野总部复电的抄件来五十八师，复电中同意我提出的条件，另外要求两条：

- 一、要维持营口地方秩序；
- 二、逮捕营口党政军首脑人物。

同时通知，四野指定辽南军区司令员吴瑞林为四野全权代表。